

明清苏州状元与文学

朱焱炜摇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苏州状元与文学 / 朱焱炜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 1 辑)
陈平原 原序 陈平原 原序 陈平原 原序

I 援明...

II 朱...

III 援① 状元—研究—苏州市—明清时代

②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援① 阅读学

② 阅读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3456 号

出版发行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 号加利大厦 缘楼 1 层

邮发代号 12-123

电话 010-12345678 发行部 010-12345678 (邮购)

编辑 010-12345678 (总编室) 010-12345678 (一部)

网发地址 123456789.com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 号加利大厦 1 层

经销中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16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字数 10 千字

定价 12.00 元 陈平原 原序 陈平原 原序 陈平原 原序 陈平原 原序 陈平原 原序

序

黄摇霖

状元,在我儿时的心目中,就是书读得最好的人的代名词,觉得非常了不起。不要说状元,就是说起秀才,也会肃然起敬。因我常看到父亲说起他的启蒙老师是秀才时,就流露出一种十分自豪而又崇敬的神情。是呀,在乡村小镇,考上个秀才,也是好不容易,状元自然是高不可攀了。而我第一次知道的状元的姓名,就是陆润庠。当时家里有一本他写的有关梅花的行书字帖。父亲就告诉我说:这个人是苏州的状元。小孩子不懂书法,看着那清丽园润的墨迹,也觉得很美,还稀里糊涂地拿它来描了一时的葫芦。苏州的状元在我的童心中,留下的就是崇高与美。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如李贽所说的,“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童心说》),慢慢地将状元与科举,与八股联系了起来;再进一步,将八股与缠足、鸦片又联系了起来,状元的光彩就慢慢地在我的心目中消褪。因此,当读到《孽海花》里的另一个苏州状元金沟(影射洪钧)时,根本不觉得他有什么风雅,有多大的学问,在赛金花的反衬下,只感到他是那么的窝囊,甚至有点下流。这或许是受了小说家言的影响,但在那个历史大背景中,恐怕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坎

里,状元确实从塔尖上摔了下来。不过,凡事总有个分寸,把状元否定得过分了,就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思索。到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过激的言论都处都是,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这句话,真是有点石破天惊,逆反地勾起了我童年对于状元的美好的记忆,引起了内心的冲突。我反复地想,这个“凡是”对不对呢?载籍中留下的有名有姓的状元有六、七百人,大量的固然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但有“真才实学”的也不是一个也“没有”啊,比如隋代的房玄龄、唐代的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代的张孝祥、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明代的胡广、杨慎,清代的毕沅、翁同龢、张謇等,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啊!实际上,即使那些不出名的,乃至不作为的状元,也不一定就是没有“真才实学”,因为有了“真才实学”还要有用武之地啊。假如手脚被一套专制的制度捆绑了起来,没有施展才学的机会,那该怪谁呢?是真的“没有真才实学”吗?再则,什么是“真才实学”?也是要具体分析的。假如将这些状元与工人比做工、与农民比种田,还比什么搞“阶级斗争”,那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了。状元们固然不清楚“阶级斗争”,但做大官,当宰相的不乏其人。他们搞当时的政治斗争应该说还是有一套的。像另一个苏州状元申时行,在明代万历年间官当到了宰相。史称他“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看来也应当归入“没有真才实学”的一类了。但要知道,当时的政治斗争既复杂又尖锐,他在张居正、反张派、万历皇帝之间和稀泥,搞得“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没有斗争的智慧与经验能行吗?所以,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凡是”是说得过分了,但在当时只是一个人独自想想而已。

文革结束后,星移斗转,状元与科举等又慢慢地得到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乃至有点吃香起来了。家里、校里、县里,乃至省里,出了一个“高考状元”之类,大家还是感很荣耀的事,大小传媒还要鼓吹一番。专门研究状元,乃至写苏州状元的专著也陆续问世。不久前,我在家乡参加过一个有关科举的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有的人

就对古代的科举制度说尽了好话,什么“公平取才”呀、“平等竞争”呀,科目设置与分地取人等等对现代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呀,这都说得不能说不,但把科举的弊端都置之脑后了。一下子又使我逆反地想起了范进、周进、严贡生、严监生、鲁小姐等等《儒林外史》中许多在科举八股中跌打滚爬的人物,想起了蒲松龄《聊斋》中《叶生》、《贾奉雉》、《司文郎》等怨气冲天的文章,想起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确实将一大批“状元”,乃至广大的知识分子都诱进了封建皇帝的“彀中”,使他们头脑僵化,文字干瘪,只会背着“四书”、“五经”在起承转合中兜圈子,谈不上有什么真才实学了。中国的社会就此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积贫积弱。呜呼,状元呀,科举呀,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正确地认识呢?

如今,生于苏州、长于苏州的焱炜也对明清时代最为集中的苏州状元作一番研究。不过,她进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状元研究,而是着重研究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状元与文学的关系。这个选题是有新意的。状元,一时被认为书读得最好的人,八股当然写得不错,那么一般的文学作品写得如何呢?他们写的文学作品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呢?假如有的话,是如何形成的呢?而苏州的状元的文章又有什么特殊的印记呢?为了回答这类问题,焱炜在系统地搜集、阅读、研究有关文献的基础上,认真考察了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地域文化,梳理了状元家族文学承传的关系,又从文体的角度分析了科举文学的总体特征及其对状元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这就为苏州状元的文学之所以能形成一种恬淡、典则、清丽的风貌找到了注脚。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又将明代的申时行与清代的彭启丰作为麻雀,进行微观的解剖,使得全文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在分析一些个案时,持论也比较平允。比如论申时行之为官,虽然指出他秉承帝意,颇受誉议,但也能看到他脾性柔和,为政宽大,为调整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可谓是苦心孤诣。论申时行之为文,尽管可以说是如同其为相一样“无咎无誉”,但能平和温雅,也具一格。这些都说得实事求是,

令人信服。

《孽海花》说：“列位国民，没有看过登科记，不晓得状元的出色价值。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培根、法国的卢梭呢？”又说：“我们苏州人，真正难得！本朝开科以来，总共九十七个状元，江苏倒是五十五个。那五十五个里头，我苏州城内，就占了去十五个。”状元，苏州的状元，这是多么奇特，多么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现象啊！而今要论苏州的状元的文学，既关系到地域文学的研究，也关系到一种特定人群所写的特定文体的研究，从材料的搜集，到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理论上加以总结，乃至对每一个状元的文学作品作细致的分析，都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焱炜所做的，只能说是开了个头。我相信以后还是有人会沿着这条路，有更多的发现，有更深的开掘，因为苏州的状元文学，毕竟对研究者们是有吸引力的。

國苑京元京怨

中文摘要

本文以明清时期苏州状元文学为研究对象,抓住了苏州这一地域与状元这一群体两大特色,从苏州状元这一独特视角,探讨了科举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科举文学的特色,苏州地域文学和家族文化传承的特点。

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的状元们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一方面精通科举取士的技巧,一代又一代都往往能够在考试中显露峥嵘,可谓仕途顺达;另一方面则学有专长、史能留名,而且多有文集问世、著作流传。

本文首先在充分蒐集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苏州状元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汇辑和考证,并列出小传,对他们的文集进行钩沉、整理和统计,并做出提要。

在此基础上,对苏州状元作整体性的研究,就苏州状元文学最突出的两点特性——区域文学特性与科举文学特性作深入阐发,并对家族谱系及状元们的作品进行详细阐述。

在区域文学方面,发达的经济,安定的社会环境,丰富的藏书,以及兴盛的出版业与教育业为苏州状元的出现创造了客观的条件;而苏州的灵山秀水、文风士风则养成了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从而形成恬淡、典则、清丽为主的深具地域特点的文学风格;同时由于状元往往具有政坛和文坛的双重影响力,成为很多人望风影从的对象,因此他

们对苏州地区士风、文风的发展方向也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在科举文学方面,八股文、策文和试帖诗,这些应试的文体,造成状元们的作品文体驳杂,文理一致,文风则趋向于典则、醇厚,一归于正。

此外,明清苏州状元,往往家学渊源深厚,其中不乏出身科甲世家。他们的文风世代传承、前映后照,既继承了前辈的传统,同时又有创新,在交流中深受师承和友朋的影响,通过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彼此融为一个创作的集体,乃至流派。

这些都决定了苏州状元们的文学作品,具备如下特色:作品体裁上,以诗文为主,词曲较少,实用性的文体数量较多;作品的内容上,诗,多咏山水田园,有很多题画和唱和之作;文,多记人论事,兼及诗文评论;作品的风格则比较典雅清丽,语气舒缓和平。

在整体研究的同时,就科举对平民与贵族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以明清苏州状元中的申时行与彭启丰为典型,作个体研究,详细论述其生平、家世、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以期从这两个代表人物身上,窥见苏州状元的全貌。虽然,申时行出身于平民,彭启丰出身于贵族,但苏州状元文学的整体性特点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上都有所体现。同时他们两人又各有特点:申时行圆融机变,文风闲雅淡定;彭定求谨慎峭直,文风真挚端庄。

粵豐城排舞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目摇录

序	(员)
中文摘要	(员)
粤语群书	(猿)
绪摇论	(员)

上摇编

第一章摇区域文学研究 吴文化与苏州状元	(员猿)
第一节摇明清苏州地区的地理与文化生态	(员远)
第二节摇明清苏州地区的土风与文风	(圆原)
第三节摇明清苏州状元文学作品中的区域因素	(猿圆)
第二章摇历史家族研究 文化传承与文学创作	(猿愿)
第一节摇宗族观念与家庭教育	(猿愿)
第二节摇明清苏州状元家族	(源原)
第三节摇明清苏州状元文学作品中的家族因素	(缘苑)
第三章摇文体研究：以文取士与科举文学	(远缘)
第一节摇八股文	(远远)
第二节摇策文与试帖诗	(苑远)

第三节 摇科举文学在文学史上之意义	(愿)
第四节 摇应举书写对明清苏州状元文学创作的影响 ...	(愿)
第四章 摇作家作品研究	(愿)
第一节 摇诗文大家	(愿)
第二节 摇制艺先锋	(愿)
第三节 摇学之大者	(愿)

下 摇 编

第五章 摇明代苏州状元申时行	(愿)
第一节 摇申时行的生平与处世为人	(愿)
第二节 摇申时行的主要著作	(愿)
第三节 摇申时行与曲艺文化	(愿)
第六章 摇清代苏州状元彭启丰	(愿)
第一节 摇世家子弟	(愿)
第二节 摇庭中灵芝	(愿)
附录一 摇彭氏名人世系表	(愿)
附录二 摇彭氏名人小传	(愿)
附录三 摇长洲彭氏家集 怨种 员源卷	(愿)
结 摇 语	(愿)
附录一 摇明清苏州状元小传	(愿)
附录二 摇明清苏州状元著作提要	(愿)
参考文献	(愿)
后 摇 记	(愿)

绪摇论

状元是中国的特产,中了状元就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政权的核心阶层,而状元的选拔标准是文章。封建时代每一位新科状元,可以说都是政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科考,成为文士的普遍选择和人们心目中的正途。这是古代文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一个大背景。中国又是一个极端重视乡党观念的国家,以桑梓郡望分群、别居、交往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文人社团也往往以此分门别派,自成一派,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大背景。而明清时期的苏州一地,竟会集了全国六分之一以上的状元,其中清代更是几乎占了四分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本文拟以苏州状元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明清时期的文学状况,期望能从一个新的视角,发掘一些新的材料,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一、状元与科举

现在,人们一般爱把成绩最好的称作“状元”,泛用于各行各业,其实这与“状元”的本义是相去甚远的。按照中国最末一科(光绪甲辰科)殿试探花商衍鎏的说法:“按状元之称始于唐,因唐制举人赴

礼部试者,皆须投状,殿试第一谓为状元,意义如此。”^①关于状元之义还有一说,那就是“状头”。在确定名次之后,既要向上级或有关部门呈报结果,又要向社会公开等第,前者用“奏状”,后者则为张榜,因此状元其实也就是“榜头”。联系到第二名称“榜眼”,则更能证明“状”与“榜”虽名二而实一。看来认识“状元”,必须注意两点:第一,“状元”是与科举制度密切联系着的,或者说,严格意义的“状元”只能存在于科举考试之中;第二,“状元”是与殿试密切相关的,或者说,严格意义的“状元”只能通过殿试才可产生出来。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大抵可以区分为六种主要形式:一是自然为官;二是选贤任能;三是乡举里选;四是养士用客;五是察举征辟;六是设科考取。总的说来,以上五种除第一种以外,其余四种,就性质上讲,都可以归之为“选举”制度;就时间而言,大抵主宰了自夏至隋,即“中古”以前漫长时期里的官人领域。与此相对的是“科举”。一般认为科举始于杨隋,但从较为系统的材料看,作为完备的官人制度的科举,应是从唐代开始大行于世的。所谓“科举”,就是统治者根据其统治需要,设立不同“科目”及相应标准,让士子选择攻取,官方根据考试成绩录取一定数量的合格者,授予官职。由于科举制度比较而言更具优越性,因而自唐迄清,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不废,成为中古以后漫长时期里主宰官人领域的制度。

唐代科举有“常科”与“制举”的区别:前者是每年定期举行的科目大抵确定的考试;后者则是科目和时间相对不很稳定的考试,而且是以天子的名义举行的。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而尤以进士科最具魅力,竟形成“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局面。唐代科举的考生分两大类: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这些举子从“怀牒自列于州

^①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5页,三联书店,1958年。

县”到至都后提交家状、文解等等,都离不开书面材料,这些书面材料,大概就包括商泝鏊所谓的投状之“状”。

“状元”和“殿试”的关系,也可以追溯到唐代。据《唐会要》载:“载初元年二月十四日,试贡举人于洛成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资治通鉴》则径谓“贡试殿试自此始”。“载初”是武则天当权时的年号,其年(706)九月九日,她便以周代唐,即位皇帝,改元“天授”。但如果说“殿试”就以此为始,又似不确。因为唐代的制举既然是以“天子自诏”的名义进行的,考试时“或在殿廷,天子亲临之”,实际上和武后的亲试没什么实质区别,而这在太宗、高宗时就已举行过。但唐代的殿试和后来严格意义上的“殿试”则很不一样。

严格的殿试,应是在天子殿廷进行的,由天子(至少在名义上)命题、亲试、亲阅和亲定录取的进士考试,而且要將所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人,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一般为七人),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为余下之人,为“赐同进士出身”。而一甲又分为第一、二、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而有资格参加殿试的,都是通过了全国“会试”的及第者——“贡士”。据介绍,宋太祖乾德二年(972)亲试制举,开宝六年(975)于讲武殿试进士,从此“殿试”成为相对稳定的制度。进士分甲,则始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79),但当时一甲不止三人,且有“五甲”之分。起初的殿试尚有所黜落,至宋仁宗时,出于怜悯,令殿试不再有黜落,从此成为常规。严格意义的“殿试”制度,要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才完成并大抵固定,并为后代所沿用,且更加周密。

从以上简略考察中可知:第一,早期(如唐代)的科举虽有“状元”,但不一定非经殿试不可;唐代虽有“殿试”,但多系为“制举”而设,其及第者不一定非定出“状元”不可。第二,严格意义上的“状元”应产生在严格意义上的“殿试”制度稳定之后,即始自明初。显然,考察明清两代的状元,在整个科举制中具有更典型的意义。